

“生活教育”概述

吕长春

陶行知先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我是个孤儿，抗日战争期间流浪在重庆，是陶先生吸收我到育才学校读书，以后又在这所学校工作的。陶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事业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在他不幸逝世时，毛主席亲笔题词，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同志称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陆定一同志在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先生逝世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时说：“陶先生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教育事业。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尤为巨大。他的主张、行动、作风，他的与人民密切联系、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我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员也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今年十月十日，是陶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想就自己所知，将陶先生毕生以赴的“生活教育”作一概述，以示纪念。

陶行知先生办教育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国情，教育工作紧密地随着祖国形势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他对生活教育曾提出六大运动：

（一）乡村教育运动（1927年3月开始）。

陶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非常关心平民教育工作，经常到老百姓中去推行平民教育。他发现中国人民中最苦的是农民。农民有三亿四千万，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无希望。陶先生说，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大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大多数最不幸的农人出发。因此，他就放弃了教授生活，脱下西装革履，穿上草鞋，到南京郊区为农民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原名试验乡村师范）。陶先生心目中所希望培养的师范生“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他们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对农业是有真才实学的。他认为只要教育与农业能携起手来，是能够为改造农村出力的。

陶先生开创的乡村教育运动是很有成绩的。他不仅办了晓庄师范学校，还在师范学校周围办了几所小学、民众学校、民众茶园、晓庄剧社、乡村医院、农民幼稚园等，开展了农村文化运动和农民武装，实行了农村地区的武装自卫。总之，陶行知先生创建晓庄师范决不是为了办一所学校，他认为这所学校的师生应该与农民团结一致，“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外力压迫奋斗，与传统教育奋斗”。陶先生搞乡村教育运动的情况还可以从《周恩来选集》的《学习毛泽东》一文中看出，文章讲：“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

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1930年南京和记洋行工人上街举行反帝罢工游行示威，晓庄师范的地下党支部就组织学生前去参加支持。

晓庄师范办得很好，很得民心，威信和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许多地方。这就必然要引起反动派的注意，独夫民贼蒋介石曾三次与晓庄接触，三次威胁也动摇不了陶先生办晓庄的决心。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后，反动派要陶先生交出校内共产党员的名单。陶先生断然拒绝。又由于冯玉祥将军在经济上对晓庄有捐助，在武器上支持了晓庄联村自卫队，反动派就造谣说晓庄准备武装叛乱，于是在1930年4月武装封闭了晓庄，数十名师生被逮捕，其中十四名学生和共产党员被杀害，陶先生本人也受到通缉，只得流亡日本。这个血的教训使陶先生认识到：用教育来改造农村是改造不了旧中国的。

（二）普及教育运动（1932年春起）

1931年的“九一八”，次年的“一二八”都给了“生活教育”以新的内容。陶先生由于通缉令尚未解除，只能用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在上海《申报》上发表时论杂文。他在《军阀的镜子》一文中写道：“压倒主人自作主，挥霍兵饷如粪土，强盗进门不抵抗，主人赶贼他不许”。^②在《颠倒的逻辑》中直接点名抨击反动派的总头目挑动内战，文章说：“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和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③此时的陶先生已经总结了晓庄的教训，接受了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认识到要改造旧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单靠农民是不行的，还得靠工人。于是他将《锄头舞歌》增加了第五段：“光禄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④虽然陶先生在当时未能认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认识了中国革命必须要工农联盟才能胜利的思想，还是很了不起了。

普及教育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使人民大众能拿到“文字”的钥匙，去开启知识的宝库，提高文化水平。引导大众关心国家，担当国事。主要的方法是引导群众创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学团”组织。陶先生亲自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以后又协助创办了报童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等许多工学团。工学团的“工”即工作，做工养活自己；“学”即科学，学习知识明白道理；“团”即团体，团结互助，团结起来保卫我们自己（学校、国家）。说得简单点即“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陶先生主张对每个工学团成员“必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六大培养：1.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2.培养普遍的生产能力，3.培养普遍的科学能力，4.培养普遍的识字能力，5.培养普遍的运用民权能力，6.培养普遍的节制生育能力”。^⑤上海市区一群流浪儿办了一个“亭子间工学团”。陶先生去看后高兴地题了诗：“吃饭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做工教学在这里，富翁惭愧死”。^⑥在工学团陶先生倡导“小先生制”，提倡“即知即传”。他发现小朋友只要善于启发培养，能力无穷。陶先生记述了山海工学团第一代小先生张健舌战外宾斯沫特莱这件事：“斯沫特莱先生到山海工学团来参观的时候，随便找了一个孩子问了几十个问题。这孩子不但对答如流，并且与斯沫特莱先生舌战了一小时之久，卒使斯沫特莱先生得到一个深刻之印象而去。这孩子便是张健。他现在只有十三岁，在萧场帮助他的哥哥创办儿童工学团。他正在领导四十几个能上学的小孩，把教育送到一百多位不能上学的小孩的門上去”。^⑦陶先生从“工学团”中看到小孩能教小孩，而且教得很好。就以小先生配合推行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于1933年正式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把教育普及到工厂、商店、农村去。不久“小先生制”普及到我国的廿一个省和四个特别市。

1934年2月《生活教育》半月刊出版，这是一本专门介绍“生活教育”运动的期刊。在此期间陶先生还开办了自然学园，又创立了儿童自动学校。搞了科学下嫁运动，打算把科学知识下嫁给儿童和劳苦大众。

（三）国难教育运动（1935年冬起）

1935年的下半年，日本侵略军继续从长城一带向我国南方迫进，眼看平津沦陷在即，广大学生深感华北虽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于是奋起斗争，首先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到上海，陶先生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一些对社会有影响、有号召力的爱国进步人士，立即响应，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发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和主权完整，严惩一切卖国贼，全国民众组织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等主张。陶先生深知国难严重，每个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生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投入到挽救国难的行动中，便提出了国难教育运动。并草拟了《国难教育方案》，成立了国难教育社。在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我们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陶先生还说：“国难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⑧，“我们今天要办一个民族解放大学，学校虽大，功课只有一门，它叫做‘救国教学做’。先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教救国，学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学救国”。^⑨

此后陶先生所领导的有关单位的工作重点都侧重到国难教育方面来了。“工学团”增加了抗日救国的教学活动，《生活教育》半月刊的主要论述及篇幅也是抗日救国教育。陶先生所领导的新安旅行团一群小孩的旅行教学活动亦是以抗日救国教育为主题。

陶先生还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四人于1936年7月15日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文章，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大声疾呼只有集合全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实行总动员，才能使抗日救国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8月10日毛主席《论团结御侮——复沈、章、陶、邹的信》，以响应陶先生等四人的呼吁，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

六月间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先生接受党和救国会的委托，与陆瑾、钱俊瑞同志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向世界各国阐述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他们遍历欧、亚、美、非四洲的廿八国。陶先生一面观察各地华侨情况，一面向各国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斗争的形势。他到处调查，演讲，写文章，放留声机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乐曲，募捐……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支援我国抗日斗争。他的工作做得细致，深入。例如他在发动华侨洗衣工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时就把用中文外文印刷的“不买日货，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人决不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等字句的纸条，请洗衣工放到洗好的衣服口袋里，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陶先生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都发动组织过华侨及各本国人民包括部分侨居的日本人民在内，上街游行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先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海岸码头上向工人们宣传，请他们不要把废钢铁运到日本去，不要帮助日本运输军火原料。从而激起了美国工人的巨大同情，导致码头工人罢工，使日本一度缺少军火原料。1938年5月4日陶先生在美国洛杉矶一个五千人大会上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军火有54.4%来自美国；日本每杀害100个中国人，其中就有54.4人是美国帮助杀害的。会上，美国议员斯各德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呼：“不愿做帮凶的人都站起来”。一下子全会场五千余人站起来了。……陶先生足迹所到之处，当地的华侨及各国人民都表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陶先生根据调查研究，对中国的抗日斗争前途得出了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其理由有三：1. 中国人民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 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 全世界各国对日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⑩请同志们仔细读一读这段话，陶先生能在1937年10月就提出中国的抗战是得道多助，持久战必胜的真理。这是十分可贵的。

陶行知先生任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后不久，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因“爱国有罪”横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陶先生在国外得知消息，万分气愤，就和陆瑾同志一道动员世界名流致电蒋介石，要他释放“七君子”。由于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曼·罗兰等十六位国际名流联名通电蒋介石，蒋大为恼火，又再下令通缉陶行知。

陶先生任国民外交使节期间，还和吴玉章同志一同在伦敦出席了世界反侵略大会，一同去瞻拜马克思墓。陶先生在诗中写道：“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马克思墓编号——作者注），小坟葬伟人”。^⑪这说明了陶先生崇拜马克思主义。

陶先生还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在会上向许多国家广泛地介绍了“小先生制”和普及教育工作，受到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等国的欢迎。印度的甘地还特地邀请陶先生去介绍推广小先生制。

（四）战时教育运动（1937年8月起）

“七七”芦沟桥抗战炮响，“八一五”全面抗战开始，陶先生非常高兴，认为中国人民能挺起腰杆子与帝国主义斗了。应该把国难教育运动推向“战时教育运动”。并提出战时教育的工作目标是“在战时工作的组织中进行教育，组织民众起来参加战时教育。”1938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陶先生在美国说：“读历史、写历史、造历史，七月七日是中华民族造历史的又一章。‘七七’的意义是 A. 打破日本的妄想；B. 打破世界的误解；C. 造成中国的统一”。^⑫这时，他在国外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及妄图灭我中华的野心。要求世界人民给中国人民以国际支援，我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振兴中华。陶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四亿五千万人民同写中华民族的新史篇。

1938年8月30日陶先生由欧美回国，到达香港时即向热烈欢迎他的同志和朋友们宣布：回国后在教育界办三件大事：甲. 办一所难童学校，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战灾儿童，为国家培养人才幼苗。乙. 创办晓庄研究所（大学），培养抗战需要的高级人才。丙. 在香港创办一所职工业余补习学校（即以后的香港中华业余学校），为国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培养抗日力量。三所学校的培养目标都很明确，即为抗日战争服务。

陶先生刚到武汉，国民党的官员就迎上来说：“陶博士，我们合作吧！”请他去安徽当教育厅长或武汉大学校长，他都坚决拒绝了。又请他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他说：“我不要做官。”国民党的官员只得涨红了面孔离去。

陶行知先生是个穷博士，他没有也不要国民党做“靠山”。因此，他要想办成那三个学校是很困难的。办难童学校非但要解决好学生读书和买文具的钱，而且连全校师生的吃、穿、住、用都要包下来。国民党表面上允许他办，但实际上不予支持，所以暂时办不成。晓庄研究所，国民党只准他办个农学院，后来连农学院也不准他办，深怕他又办出第二所红色的晓庄师范来。特务头子陈立夫恐吓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陶先生回答

道：“他们是否共产党，额角头上未刻字，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可呢？”^⑩香港业余补习学校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办起来了，该校的教学内容既结合抗战又能联系职工的生活和工作实际，教学方法生动活泼，教师大多数是著名的学者和专家。该校确实为香港同胞投入抗日战争和以后的革命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战时教育运动期间，在武汉成立了抗战教育社，出版《战时教育》旬刊。还成立了战时教育团，号召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到老百姓中去，向老百姓宣传抗战。陶先生在《战时民众教育》诗中唱道：“跟老百姓去，领老百姓来，去的时候象逃走，来的时候是打回来！”^⑪陶先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要生活教育社的同志深入到难民中去，为的是组织他们参加抗战，收复失地，胜利地打回老家去。

（五）全面教育运动（1938年冬起）

陶先生认为抗日战争是争取整个民族解放的战争，决不是仅仅依靠军事所能解决。必须是全国各界、各业、各阶层、各党派……的全面动员，进行全面抗战，教育当然也应该是“全面教育”。他写诗号召全体生活教育社社员投入全面抗战教育：“青菜豆腐糙米饭，还要看、要想、要谈、要玩、要干。唤起四万五千万，瞄准侵略，战，战，战！”^⑫

陶先生回国后看到千百万流离失所的难童所过的生活比他想象的更坏，他们精神上蒙受的侮辱与创伤更超过物质生活。他决心要把难童学校办起来。不久他又折回香港去筹划，争取援助。回到重庆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关怀，党派了林琼等一批党员同志到校建立地下党支部，支持陶先生办难童学校。1939年7月25日育才学校（即难童学校）在重庆市郊草街子乡的一所古庙——古圣寺里开学了。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引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⑬这所学校教师的特点是专家多、共产党员多，例如贺绿汀、章泯、艾青、陈烟桥、魏东明、陆维特、水华、丁华、戴爱莲、戴白韬、许士骐等都是该校教师。这所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是按照学生的特长和爱好编组学习，分音乐、戏剧、美术、文学、舞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七个组学习。教学方法是：课堂教学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习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学习具体知识与学会学习的方法相结合，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材使用上是极严格的，坚决不用国民党教育部编的《国文》、《党义》、《公民》等课本，增加了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还经常选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的好文章。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讲话》就成为我们当时的语文课教材。陶先生当时曾说：“这个讲话不仅是说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也使我明白了教育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陶先生还规定育才的师生人人要参加适当的劳动，陶先生本人也不例外，每周有二、三节劳动课，种菜、筑路、修露天舞台等等，记得当时学校中番茄种得又大又好的要数音乐家贺绿汀先生。育才的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到农村去访贫问苦，送教送医上门，教农民及他们的子女明理、识字，我们称这个活动为“走亲戚”。学生称男教师为大哥、女教师为大姐，亲如家人，师生之间互敬互爱。一群流离失所的孤儿在这样好的环境里人人奋发向上，努力学习，进步甚快。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育才学校，他和邓颖超同志在张晓梅同志陪同下，于1940年9月专程到校看望师生、指导工作。总理给师生们讲形势，还亲笔在许多同学的小本本上写了“一代胜似一代”的题词。周恩来同志回到重庆十多天后，即派人送给育才学校四百元，指定作

买运动器具之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对陶先生的事业的支持及对培养人才幼苗的关怀。

1940年冬,育才学校音乐组学生在重庆举行儿童音乐会,陶先生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和冯玉祥先生到会指导,还请了一些中外记者来参加。仅仅到校学了一年半音乐的儿童,表现得有相当的水平,周恩来同志听完后高兴地当场为十五岁的陈贻鑫同学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六) 民主教育运动(1941年起)

“民主教育运动”这个口号,陶先生早在1939年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许诺将施行“民主宪政”时就提出过,但那是反动派骗人的手法,根本做不到。到1941年已是反动派事事、处处、时时赤裸裸地搞独裁,压迫人民,向人民大众猖狂进攻的时候了。反动派放手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积极准备投降,而对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搞围剿、袭击,蒋介石又大搞“攘外必先安内”的故伎。在这种形势下,必须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投入斗争!于是陶先生提出了“民主教育运动”。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形势突变,育才学校的许多地下党员转移了。几天后敌人的军、警、宪、特来校捕人,扑了个空。“皖南事变”给育才师生上了一堂最好的“谁是敌我”公开课。我们这批少年学生从这个时候起在政治上懂事了。

蒋介石眼看陶行知和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的关系比前更密切,真是咬牙切齿地想封育才的门。但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牌子还不能取下来,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只好另下毒手,掐断育才的经济来源。育才是一所私立学校,二百余师生天天要吃饭,日子真难过啊!已经被困得连发了霉的米也吃不上了。许多好心的朋友劝陶先生丢下育才吧,何必顶着石臼做戏,抱着石头游泳呢?陶先生考虑了几天以后是这样的回答的:“人才幼苗急待培养,我不能自动停办!”“武训能讨饭办三所学校,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将何以对得起小朋友,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⑩“我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在游泳哩!越游越有劲。从今天起我也要讨饭兴学,发挥‘新武训精神’。”陶先生提出的“新武训精神”是对反动派的斗争,是向社会的控诉。陶行知办教育不怕反动派封锁、不怕威胁、不怕压。

周恩来同志是十分了解育才的经济困难情况的。请徐冰同志送了一套解放区南泥湾大生产的照片,和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衣给陶先生。陶先生很受启发,立即筹划组织师生开荒,生产自救,先后建立了三个农场(都属于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因为按照陶先生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办学,使很多少年学生才华骤露。但是,有的人却说陶先生是在办天才教育。陶先生回答说:我不是办天才教育,我办的是人才教育。按照每个人的特点、才能、爱好,定向培养(因材施教),对他提出一定要求。学生勤奋学,达到了这一定要求,“人”字上面加上“一”字就成为“大”字,即人才转化为“大才”(人→大)。对大才再加工,出一身力,流一身汗,一定时间后“大才”也就成为“天才”了(人→大→天)。天才是师生经过教学做的活动培养出来的,天才不是天生的。为国家,为人民多出几个天才又有什么不好呢?

反动派的思想封锁越来越严重了,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育才学生的《茶馆小调》、《古怪歌》等反映人民反抗精神的歌曲到处传唱,好象匕首一样刺向敌人心脏。陶行知先生也在这时意味深长地补上了一个演讲,他说:“过去封建士大夫讲时髦,把女人的脚裹得越小越好,越小越美,称之为‘三寸金莲’,现在蒋委员长更时髦,发展到罗

统治人的言论、思想，要缩小到官定范围，越小越好，越小越美，要搞‘三寸金头’了。”这次讲话对育才师生是一次至要的政治思想教育。1943年的“五四”青年节，他又在北碚的复旦大学纪念会上讲了一次，这个诙谐的讲话使复旦师生精神振奋，热烈鼓掌欢迎。可是坐在台上参加纪念会的国民党官老爷被刺得坐立不安。抗战胜利后，“三寸金头”又在上海的沪江大学再讲一次，轰动了该校，对推动上海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强奸北大女学生，打死我三轮车工人，但他们却逍遥法外。育才师生带动兄弟学校师生化装上街游行示威。反动派的特务、警察破坏游行，打伤我校十多名同志，但敌人的狰狞面目在此暴露无遗。

毛主席亲赴重庆跟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以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陶校长曾多次见到毛主席，后来又机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并在机场摄影留念。陶先生还自带领育才师生去沧白堂参加旧政协促进会和较场口举行的旧政协达成停止内战协定的群众大会。两个大会都遭到敌人破坏，育才师生都险遭毒打。沧白堂事件发生后，陶校长愤然写诗：“主人要说话，公仆摔石头；纵被石打死，死也争自由”。^⑩这短诗充分体现了陶先生是一个热爱人民，热爱真理，英勇斗争的民主战士。

在民主教育运动最高涨的时候，陶先生和他的老战友李公朴先生等在重庆地下党的支持下创办了社会大学。她一诞生就成为重庆市的民主运动营垒，是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一个基地。因而又是反动派的眼中钉。在办了一年另一个半月时就被反动派武力封闭了。但她还是为重庆市、四川省培养了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战士。

陶先生于1946年4月由重庆到上海，立即投入上海的民主斗争运动。他在上海生活的九十九天里，在学校、工厂、机关、广场作了百余次演说。当他先后得知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后，悲痛万分。他清楚地知道敌人的第三颗无声手枪子弹已瞄准了自己，但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在七月十六日给育才师生的信中说：“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消息。如果消息确定，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⑪

陶先生预感到他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要争取最后几分几秒对人民多作些贡献，不顾自己的高血压症，夜以继日的工作，疲劳过度，又因时局剧变刺激过甚，竟以脑溢血症于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他为人民革命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代人民教育家、伟大的民主战士陶行知先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精深博大的学说，是十分可贵的遗产。作为他的学生，我要努力学习，使之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注：

- ① 陶行知：《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
- ②③ 陶行知：《斋夫自由谈》（1932年）。
- ④⑥⑪⑭⑮⑱ 《行知诗集》。
- ⑤⑦⑨⑯ 《陶行知教育论述选辑》。
- ⑧ 陶行知：《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1936年）。
- ⑩ 陶行知先生给夫人吴树琴信（1937年10月5日）。
- ⑫ 《陶行知先生游历廿八国日程表》。
- ⑬ 戴百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
- ⑰⑱ 陶行知：《育才学校》，教育书店版。